

东亚哲学与21世纪

陆玉林著

东亚的转生

——东亚哲学与21世纪导论

张立文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DONGYAZHE



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东亚的转生

——东亚哲学与
21世纪导论

陆玉林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的转生：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导论 / 陆玉林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
《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丛书
ISBN 7-5617-2281-8
I . 东... II . 陆... III . 哲学 - 研究 - 东亚 IV . B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452 号

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丛书

东亚的转生

——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导论

著 者 陆玉林

组稿编辑 陈丽菲

特约编辑 吴法源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62571961

传真 021-62860410

<http://www.hdsdbook.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89×1220 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一次

印 数 3500

书 号 ISBN 7-5617-2281-8 /B·131

定 价 13.5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东亚面临的挑战与 总序

张立文

世纪之交和千年更迭，是时间性的称谓，原为人的设定。它在约定俗成后，时间的确定性就是无疑的了。随着时间的进展，特别是面临此千载难逢的时机，它对于世界一些地区和人民来说确实是激动人心的，但对于另一些地区和人民来说心情却是沉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千年千禧与千难并存，机遇与危机相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地间万事万物，总是冲突融合而和合。

东亚无论从地缘政治上看，还是从哲学思想上看，都是一个充满着多元冲突融合的地区。这个地区由于其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既存在着东亚的文化，亦存在着文化的东亚。作为东亚文化和文化东亚的核心的东亚哲学和哲学的东亚，两者的所指既同又异：同是指其哲学和合体；异是指其各有其侧重点。从作为哲学和合体的东亚而言，传统上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融突和合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哲学共通性和哲学精神的共识性。

公元前3世纪到3世纪，华夏文明以儒家学说为重心以及稍后的中国化佛教哲学和中国的道教哲学，传入朝鲜半岛而后传到日本列岛和越南。被传入国依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来理解、诠释、接受、改造华夏文明的儒释道文化和哲学，融突和合而化育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哲学。比如作为朝鲜传统民族精神特征的

2 / 东亚的转生

“花郎道”，是中国儒释道文化思想和朝鲜传统文化思想的融突和合。花郎道又称风流道、风月道。产生于新罗真兴王时，花郎道的思想精神意蕴是“世俗五戒”，其内容是“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作为花郎徒的修养要义与实践准则。崔致远在《鸾郎碑序》中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包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花郎道是儒家孔子之忠孝，道教老子的无为不言，释教的善恶观等的融突和合。日本是“和魂”与“汉才”的互相冲突融合，其后吸收汉学，即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和合而成日本文化和哲学。融突和合是中、日、韩三国文化和哲学生生不息的主要形式和生命智慧之所在。

朝鲜半岛在高丽末传入中国的性理学（或称宋元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经朝鲜李朝学者群体的解释和阐发，而成为朝鲜的朱子学，这是中国朱子学与朝鲜传统文化思想融突和合的结果，而被作为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13世纪初，宋学著作已渐传入日本，朱熹的《中庸章句》抄本署有正治二年（1200年）大江宗光的识语。朱子学由日本学者群体的解释、发展，融突和合形成诸多学派，在德川幕府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宋明理学（或称性理学）在与朝鲜、日本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冲突融合中，形成朱子学各派（如朝鲜李朝的主理派、主气派、折衷派等；日本的客观经验理派、主观道德理派，或称主气派——知识主义派，主理派——精神主义派等）。这种多元的融突和合与融突和合的多元，使哲学东亚与东亚哲学呈现绚丽多姿、生机盎然的生命力。

这种情境一直延续下来，19世纪，东亚各国先后都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冲突，这次社会转型的政治改革，唯日本获得了成功，中国和朝鲜的维新变法（中国的戊戌变法，朝鲜1890年自上而下改革）均失败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掠夺殖民地的军国主义道路。他们对一衣带水的朝鲜和中国，采取殖民侵略政策，

朝鲜半岛在 1910 年后沦为日本殖民地。从 1931 年到 1945 年日本发动了大规模、残酷的侵华战争，在中国实行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细菌战争和“三光政策”。为了美化侵略战争，作为日本精神的“大和魂”被当时的一些哲学家所大肆鼓吹，成为侵华战争的精神武器。在这种情境下，多元冲突融合而和合的哲学东亚与东亚哲学，遭到了致命的破坏。

二战以后，东亚又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冲突。这种转型是指社会结构状态的转换，换言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尽管东亚各国转型的速度、深度有异，但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却是共同的趋势。有异，表征着东亚各国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磨擦与冲突，而给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共同，指东亚各国不仅面临着共同化解人类所遭遇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和五大危机（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的和合发展，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东亚经济发展愈来愈需要区域合作，以及在保护环境、防治疾病、打击犯罪集团等方面合作的加强等。在这种全球化意识推动下，唤起了“东亚意识”的觉醒，随之而来的是“东亚哲学”的不断觉悟发展。

“东亚意识”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经世意识、反省意识、批判意识和反霸权意识，概言之，其实质是融突的和合意识。融突和合是中国、印度、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人类现代社会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向，也是东亚地区当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现代人对于信仰、言论等自由的基本权利的企求，现代社会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律制度等健全、完善的需求，都体现了一种对于和合精神与和合原则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原则作为一个总体性原则，实是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现实需要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是世界各族人民要求和平共存，各种族和各国家要协调发展的紧迫需要，因此，和合原则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使东亚传统多元融突和合的文化和哲学的断裂得以延续，其传统的弊端得以修正和化解。

4 / 东亚的转生

东亚哲学与哲学东亚作为东亚的多元化意识的提升，其底蕴是融突和合哲学。和合学的理论公设是元素差分，结构整合，中介转换，功用择优和反演流行。和合哲学的生命智慧和本真世界，是三维立体结构：一是以地道柔刚为象征，以物理实有为内涵的和合生存世界；二是以人道仁义为表象，以伦理价值为核心的和合意义世界；三是以天道阴阳为表征，以名理逻辑为枢纽的和合可能世界。这就使哲学知识论、人学价值论和符号逻辑学达成融突和合。

基于东亚哲学的融突和合，“观”人类 21 世纪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人类可通过最低限度的共识而获得五大中心价值或五大原理，即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来融合种种冲突和危机。

东亚哲学与新千年问题的研究，之所以选择和合学作为东亚哲学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基础，其主旨是在于这一理论能让人们有效地化解研究对象，还在于它契合东亚的历史与现实，而具有可行性的目标。在新千年，东亚的融突和合哲学发展的现实条件将越来越充分，其活动空间将越来越拓展，其实现的机遇将越来越多。

《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丛书，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朱杰人教授的支持，陈丽菲副编审和其同仁的具体指导及审稿，颇费心力。我谨代表课题组成员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东亚的哲学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就要来临。世纪交替，千年更迭，正应反思过去，筹划未来。20世纪上半叶，东亚经历了重大的挫折；下半叶，东亚人创造了“东亚奇迹”，在西方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持续推进现代化；而在20世纪临近终结的时候，又被经济衰退的阴云笼罩。20世纪的东亚文化，在东西方的冲撞中没落而又慢慢走向复苏与兴盛，但兴盛之中仍潜藏着危机。21世纪，东亚又将如何呢？东亚经济是否能再次崛起，东亚文化是否能重塑辉煌，东亚哲学是否能成为世人的智慧之源，我们且拭目以待。无论如何，东亚都将不再是“远东”——遥远而落后的地方，但21世纪也不能说是东亚的世纪。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东亚，特别是将东亚作为一个关联性整体来认识；我们需要重估东亚，重估东亚的发展模式和哲学、文化。

一 文化东亚

东亚，从地理上讲，是指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东部的大陆、半岛与海岛。一般而言，可以将东亚作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东亚指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广义的东亚是除上述地区外，还包括东南亚即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我们所讲的东亚，从地理上讲，主要是狭义的东亚。

东亚，不仅是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无论是从历

2 / 东亚的转生

史还是从现实来看,都存在着文化的东亚。文化的东亚,即文化东亚,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内在的文化共通性和文化共识,有着相当强的文化内聚力的文化和合体。文化东亚所指称的地域,除地理概念上的狭义的东亚之外,还包括新加坡等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地区。

文化东亚将东亚界定为文化上的和合体,因而与东亚文化这一概念有所不同。东亚文化,只是地缘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侧重的是东亚这一地缘,而不是东亚在文化上的和合性。文化东亚侧重于强调东亚是文化和合体,而不是其地缘性特征或地缘上的共在性。文化东亚与东亚文化的不同还在于,文化东亚这一概念,不是一个政治性话语,而东亚文化或多或少地带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性的话语成分。因此,我们讲文化东亚,也有将某种政治性话语过滤出去的意思,而强调东亚在文化上的和合共在性,以及曾经有过、现在还在持续的文化共识。

东亚,“从人类学上讲,这一地区的人民同属蒙古人种,文化上也曾先后次第地趋于同一。所谓‘同文同种’的话曾广为流传。迄至中西文化撞击的近代,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出的内聚力一直十分强大,并有其鲜明的特点。”^① 19世纪中叶之前的传统时期,华夏文明辐射到周边地区,形成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以华夏文明为纽带,以朝贡贸易和册封体制为特征的东亚世界体系。这事实上是一个文化的东亚。

20世纪50年代东亚经济开始崛起,到七八十年代,在人们寻求东亚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时,重新发现在东亚地区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文化传统,因而不但把东亚作为一个经济圈来考察,同时也将它作为一个文化圈来考察,即所谓“儒教文化圈”,人们所言的东亚更带有一种文化的意味。

从传统与现代两方面来看,东亚都可以说是文化东亚。人们都

^① 汪德迈:《新汉文化圈》,第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导　　言/3

在自觉不自觉地从文化东亚来看待东亚世界。我们所说的文化东亚是一个和合的概念。作为一个和合的概念，文化东亚的形成有一个和合发展的过程；现时代的文化东亚包含着冲突与融合。

文化东亚曾经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而和合发展起来的。传统时期，华夏文明在和合中发展。^① 和合生成的华夏文明不但滋养着中华本土的人民，而且泽被四邻。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的人民在接受汉文化时，也依据自己的传统和对汉文化的理解而加以改造，和合生成具有本民族、本地域特色的文化与文明。在此，我们不详细研讨华夏文明自身的和合发展，只简要述及文化东亚的和合生成。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文化东亚的和合发展是以华夏文明的和合生成为前提的，华夏文明是文化东亚的内核。传统时期文化东亚和合生成的主力军也是华夏文明向四周的辐射。

华夏文明向四周辐射的第一圈是朝鲜半岛、越南等地。这一区域与中国接壤，文明初起时都曾纳入中国的版图，立国后也曾维持臣属关系，接受册封。这些地区不但主动接受了华夏文明，而且有意仿效中国的典章制度等。当然，这些地区有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是以不断丰富自身文化传统的方式而加以消化吸纳。因此，虽然华夏文明业已融入这些地区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但是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自有其不同于华夏文明的地方。

华夏文明向东亚其他地区辐射的第二圈是日本列岛。日本接受华夏文明的情况与朝鲜、越南等与中国接壤的地区不同。公元6世纪之前，汉文化或者说华夏文明传入日本的主要是中国移民和经朝鲜半岛的中介；七八世纪，日本为中国文化所折服，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浪潮，直接派人到中国学习、模仿、移植中国文化。这种模仿、移植是有限度的。虽然日本在七八世纪要求中国化，但其固有之文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种中国化实是以日本之固有的文化精神，活学活用中国的文化，即如菅原道真所言“和魂汉才”。因此，虽然可以如

^① 张立文：《和合学概论》，第394—413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 / 东亚的转生

汤因比所言将日本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远东分支,但这一分支有其自具一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人处于中国文化圈的遥远边缘地带,有可能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紧紧保住自己的主要制度和价值标准。……日本人并不是简单地推出一个中国文化的小型翻版。他们创造出的某些社会制度和政府类型,反而令人吃惊地和西方类似。日本的封建制度、对海洋的向往、强烈的民族意识,都是和中国传统大不相同的。”^① 不过,虽然日本文化有自身的特色,但是在传统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保持着压倒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华夏文明的大规模输出,朝鲜、日本等地的广泛吸纳,在传统时期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明为内核、以朝鲜为中层、以日本为外圈,并影响到东南亚等地的文化东亚。在这一时期,东亚是关联性的、互动的整体,华夏文明或者说汉文化是联结这一整体的有机纽带。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东亚,东亚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就中国、日本、朝鲜而言,中国与朝鲜所遇到的危机十分严重,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始终处于危机之中;而朝鲜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也陷入危机之中达80多年之久。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相比,用了不长的时间就摆脱了危机而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脱亚入欧”的日本事实上又加重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亚其他国家的侵略,使得传统的东亚世界体系全面崩溃。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朝鲜、日本还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实难维系一个文化东亚。可以说,这是文化东亚的解体时期。东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被割裂、打破。取代文化东亚的是一个战争的、不幸的东亚。

文化东亚虽然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之下经历了一个解体的时期,但是“病树前头万木春”,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东亚各国经济

^① [美] 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中译本,第5页,商务印书馆,1997。

的次第发展,东亚各国又再次面对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之时,“儒教文化圈”被提了出来,表明人们看到东亚不仅是地理的、经济的东亚,也是文化的东亚。人们不仅看到了东亚的各国、各地区,而且也看到了东亚是一个整体——文化的、和合的整体。文化东亚由此进入了一个重建时期。

文化东亚,就传统言,是实存的;就现代言,是要重建的。传统与现代、实存与重建并存、互根。没有传统的文化东亚,就不可能有现代的文化东亚。现代的文化东亚建立在传统的文化东亚之上,没有传统的文化东亚,现代的文化东亚就没有重建的基础;同样,没有现代的文化东亚或者说不重建文化东亚,传统的文化东亚就没有时代价值。文化东亚是实存的而又是要重建的,因而是发展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这正是文化东亚的和合性所在。

文化东亚的和合性,不仅体现在传统与现代、实存与重建的时间性和合,也是东方与西方、东亚地区内部的空间性和合。从空间性一面来看,现代的东亚各国(地区)大都或多或少地接受、吸纳了西方文化,都存在着如何融突西方文化的问题;20世纪的东亚地区内部曾发生过非常严重的冲突与对抗,因而又存在着如何化解历史和人为地造成的民族冲突和紧张的问题。文化东亚内在地包含着这些问题,也是为化解这些问题而设。

东亚是文化东亚,东亚各国(地区)有共同、共通的文化传统,面对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是一个文化上的和合整体,东亚地区的有识之士应当也能够抛开各种不利因素,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共同谋求东亚的发展。当然,文化东亚作为一个和合概念,并不排斥差异、对峙与冲突。东亚地区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有差异,也就有摩擦与冲突。但是,文化的差异、摩擦与冲突并不是毁灭性的,并不构成对文化东亚的整体性摧毁。实际上,这种差异性正构成了东亚文化的多样性,并内在地推动着东亚文化的发展。文化东亚的重建需要认识到东亚是文化上的和合整体,需要交流、对话与合作,更需要认识到文化东亚内在的差异

6 / 东亚的转生

性，否则，就只有“同”而没有“和”，也就没有真正的交流与对话，没有真正的文化发展。

今天，当东亚某些国家、地区陷入金融与经济危机，整个东亚的发展面临严重挑战之际，我们更需要强化这种文化东亚的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东亚不仅是地理东亚、经济东亚，更是文化东亚。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对东亚作整体的思考，才能从整体上思考东亚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出路。

二 21世纪的东亚

21世纪的东亚是什么样的东亚？21世纪东亚的文化与哲学又是怎样的？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一切似乎都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只要还没有进入21世纪，我们就难以准确地预见21世纪东亚的发展实情；甚至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预测未来。20世纪东亚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东亚的发展，现实地构成东亚21世纪发展的基础，同样也可作为预测的共识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对东亚21世纪发展有所判断。毕竟，历史的跳跃性或断裂性发展的情况不是常态，而即使是断裂性的发展，在其发生之前，也有迹象示人。当然，我们必须明白，未来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20世纪的东亚经历了严重的挫折，也创造了“经济奇迹”，某些国家和地区又陷入金融与经济危机。粗略地看来，似乎是一个循环，又似乎杂乱无章。但是，东亚的发展并非杂乱无章，“其中心内容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东亚现代化史的三个突出特点是：1. 它把西方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大变革压缩成为短时期的急速转变。2. 它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破坏与延续的深刻矛盾运动，对传统的变革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传统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3. 它是通过多条道路过

渡向现代工业社会和进入现代世界的，既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多种模式，也有社会主义方式的多种模式，这些模式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每种模式的弱点都在实践中受到检验与修正，向混合模式方向转变。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化的，但现代化的大方向是趋同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① 这就是说，东亚 20 世纪的最根本的主题是现代化。在此，所谓的现代化，不是某种目标，而是实际的社会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转变的不仅是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也不仅是环境、制度、艺术等社会文化，而且是人的生存的转变。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各种“主义”之争、各种道路与模式之争，事实上都是围绕着这种转变而展开的。

21 世纪，东亚社会的转变将持续，现代化进程仍然会继续推进，但其推进速度和前景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国际关系和经济关系，取决于东亚各国的体制与政策，也还取决于东亚的文化精神。事实上，这些方面，都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因素和动力，同样也是导致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出现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主导因素，而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的重新崛起也需要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这并不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是由事情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换言之，这些因素是历史的、变化发展着的，不是同一个“萧何”，不是一成不变的。拿体制与政策来说，东亚各国（地区）的体制与政策，在数十年前可以创造经济奇迹，但同样的体制与政策，却也能够促成经济危机。原因在于，这种体制与政策在数十年前是与外部环境、与发展趋势相吻合的，而在外部环境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体制与政策已与之不相吻合。同样，如果体制与政策重新调整，而与外部环境与发展趋势相吻合，体制与政策就能够产生持续创新效应而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因素亦然。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讲，并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只能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政府或其他组织制定及实施规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 9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 / 东亚的转生

则,以及人们遵守这些规则的行为的影响,来发挥一定的作用”^①。相应地,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因素自身的变化。当有些学者将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成功归功于儒家文化时,事实上这里的儒家文化已不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经过欧风美雨冲洗之后,业已发生了嬗变的儒家文化。总体上讲,虽然我们并不能准确地预见东亚21世纪的发展前景,但是可以肯定东亚要在21世纪重新崛起,需要体制与政策的重新调整,需要文化上的重塑。

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之下,已经开始逐步调整体制与政策。这种调整是否能使东亚经济尽快复苏,步入发展与繁荣的轨道,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我们相信东亚在21世纪能够健康地发展。

21世纪东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即使我们并不认为儒家伦理对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东亚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不可能不受东亚人的意识与精神所左右。我们更应当看到,即使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现代化,而如果没有文化的即人的意识与精神的现代化,那么这种现代化是否能增进人的福祉,也是值得怀疑的。物质富裕而精神空虚,人的身心陷于分裂和冲突状态之类的现代病或者说现代化之病自不必说,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人的意识和精神的现代化作为支撑,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成果有可能因此而毁于一旦。胡适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曾精辟地指出,“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重大的不利之处。日本领导人在较早时期实现这一急速的转变,他们之中的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相。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

^① 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第1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护大量中世纪的传统文化，在这其中有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① 胡适的这番话不幸而言中，由于拒绝了西方的精神特质，同时也拒绝了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日本早期现代化的结果不是给本国人民带来福祉，而是给本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毁灭了早期现代化的成果；更给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阻断了东亚其他各国的现代化进程，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此而言，文化的特别是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人的福祉来说都是如此。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是人的意识、精神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人的意识与精神。换言之，是东亚人的意识与精神或者说文化传统推动了东亚的经济起飞，还是东亚的经济起飞之后，人们的意识与精神发生了改变而重新拾起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必须创造与东亚人的现实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能够促进东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够增进东亚人福祉的文化。

这种文化是可能的，而且是在创生之中的。说其可能，一是因为东亚地区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创造新文化的资源；二是在历史上东亚特别是中国有创造性和合他文化成功典范，如佛教之中国化、宋明思想家和合佛教等而创生的宋明理学等等；三是东亚的经济腾飞证明了东亚人民具有杰出的创造才能。说其在创生之中，是因为东亚各国（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在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之时，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正在呈露。虽然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尚不确定，也难以论其短长、优劣，但身处其中的人却是可以感受到的。就中国大陆来说，“1979年以后，我国的改革逐渐倾向于改变社会的运转机制，相应地，人的价值判断系统也同时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和一切向钱看的哲学发生了激烈

^① 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74页。

的冲突,甚至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连绵了几千年的传统伦理原则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有人把这些现象看成是道德的退化。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说这一切变化都是朝着好的方向的变化,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信无疑的,那就是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特别是伦理观念的重组,这个过程是绝不可能完成的。”^① 价值观念的重组,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新的文化的产生。因此,我们相信,在东亚 21 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东亚各国(地区)的人必将会也能够重塑文化精神,创生出新的文化。

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来看,21 世纪的东亚文化应当是和合的或者说具有和合性的文化。东亚各国“有某些共同的伦理道德意识、礼仪制度、审美意识,又各有自己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各国均有自己民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生活方式,这便是差异,有差异便有对待,有对待便有冲突。有差异、对待、冲突便有多元化的现实和多元化的意识。有差异、对待、冲突,才构成‘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殊途’和‘百虑’,才构成‘同归’和‘一致’的融合。这个‘同归’和‘一致’,……在现代便是和平发展之道、融合对话之道、生态环保之道,这便是东亚可能融合的理念和价值。”^② 再者,这种和合性的文化也将融会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精神与价值,是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东方与西方交融的产物。这样的文化不仅能滋养东亚地区的人民,也将为世界贡献一份智慧。

三 和合学方法

东亚是一个关联性整体,对东亚的哲学、文化和经济等需要作整体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东亚史的研究都是以国别进行的。对 19 世纪以前东亚发展的整体关联性至今研究不够,而对 19 世纪以

①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 99—100 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② 张立文:《“东亚意识”何以可能?》,《亚文》第一辑,第 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